

〔第1事件〕2006年（ワ）第6484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王子雄和另外39名  
〔第2事件〕2008年（ワ）第18382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吴及义和另外21名  
〔第3事件〕2008年（ワ）第35183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刘国珍和另外44名  
〔第4事件〕2009年（ワ）第35262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夏振东和另外80名

## 陈 述 意 见 书

2011年12月19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13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江北区通用新村94-5

重庆大轰炸诉讼原告 简全碧（Jian Quanbi）

### 1 序

我叫简全碧，于1938年5月生于重庆市渝中区，现年73岁。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军利用军机对当时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全省进行了反复无差别的狂轰滥炸。特别是1939年、1940年、1941年3年间，集中进行的轰炸次数超过两百次。大轰炸使得重庆以及四川省全省的无数平民失去生命、遭受重伤，失去家园和财产。

当时居住在重庆的我的家庭，在1939年5月4日和1940年8月19日先后遭遇了两次日军的大轰炸。第一次轰炸我家的房子和财产全毁；第二次轰炸我的祖母被炸死、我受到重伤。

遭受轰炸时，我还非常小。但对于轰炸到底是什么，轰炸到底有多残酷，却是通过我身体所受的伤害懂得的。此外，包括父母在内的无数受害者的鲜活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很多。

这次，我是为讲述悲惨的受害事实而来日本的。下面，我站在这里，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的法官和爱好和平的日本各位人士讲述我家所遭遇的大轰炸经历，强烈呼吁日本政府能够刻不容缓地实现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谢罪和赔偿。

## 2 第一次遭受轰炸的情况（1939 年）

我于 1938 年 5 月 18 日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的药王庙街（划线部分参照所附地图，下同）。父母属于晚婚，我是长女。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简少堂 54 岁，母亲邹壁清 39 岁。

父亲年轻时一直从事教师工作，50 岁后又做律师工作（父亲的照片参照照片第 11 页）。

母亲性情温顺，作为一名主妇，她坚定地守护着家庭，又一直挂虑着年过五旬的父亲。

我的家庭在遭受轰炸后，如下所述受到了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大力相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家所受的灾难将更为深重。这里我先介绍一下父母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有哥哥邹云臣、母亲本人、妹妹、弟弟邹森云 4 人；父亲的兄弟姐妹有父亲的姐姐（其丈夫姓李）、父亲本人、以及父亲的妹妹（其丈夫姓陈）3 个人（父亲的姐妹的照片参见照片第 12 页）。

自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重庆人民的生活变得不安起来，人心惶惶。1939 年后，由于轰炸越发剧烈、死伤者越来越多。

1939 年当时我家有三口人，父亲、母亲和我，居住在我出生的药王庙街，房屋为父亲所有。由于当时日军的轰炸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父亲担心家人安危，于是决定同年 3 月举家前往住在重庆西面郊县璧山的大舅邹云臣家避难。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三口都在璧山大舅家生活，只是父亲时时回药王庙街自家里看一下情况。

1939 年 5 月 3 日、4 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这就是有名的「5·3、5·4」大轰炸。

幸好，我家三口人因在重庆璧山大舅家避难而没有遭受人身伤害。然而，药王庙街一带却在 5 月 4 日的轰炸中受害，我家一楼一底约 170 平米的房子却因遭受炸弹及大火而全毁。

「5·3、5·4」两天后即 5 月 6 日，我的父母回到药王庙街。然而，所有的建筑物已荡然无存，连我家房子的所在位置都找了好久才勉强找到。

看着因遭受轰炸而全毁的房屋残骸，无家可住；想着曾经倍加珍惜的诸如雕刻着古汉文的贵重家具等尽失，父母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尤其是母亲，在 5 月份的轰炸之前就已怀有身孕，本来就有些心神不定，加之房屋被炸毁、财产尽失的巨大变故，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渐渐没有了笑颜。大轰炸后，她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郁郁寡欢。

父亲见母亲如此状况，担心住在人口众多、忙碌的璧山大舅家里会使母亲身体更加不好，同时考虑到不久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觉得比起住在璧山的大舅家，不如让母亲住更宽敞的房子，使她能宽心。于是，父亲恳求了住在重庆市渝中区关庙街的奶奶，在奶奶家住下。奶奶当时拥有一套二楼一底 180 平米十分宽敞的高级住宅（奶奶的照片参照照片第 13 页，其照相馆所在的杂粮市参照 17 页地图）。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人便开始在奶奶家跟奶奶一起生活。

1940 年初，母亲在关庙街的奶奶家生下了妹妹。父母为妹妹取名为简清明。

然而，妹妹出生后，遭受了轰炸打击的母亲又因抚育我和妹妹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而渐渐有了患上精神病的倾向。

### 3 第二次遭受轰炸的情况（1940 年）

我家遭受第二次轰炸是在 1940 年 8 月 19 日。第一次轰炸受害后我家搬到奶奶家居住，而奶奶家所在的关庙街是重庆

的中心。因此每次日本军机飞来重庆的时候，父母都会和奶奶、妹妹以及我一起逃到防空洞避难。

8月19日那天，预告轰炸迫近的紧急警报拉响，父亲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母亲，就先抱着妹妹、护送母亲出门，到离奶奶家10分钟左右路程的防空洞避难。

随后，奶奶也抱起我出门，准备跑向同一个防空洞。然而，此时日军的轰炸已经开始，炸弹在我们居住的关庙街一带投下了。这其中的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奶奶的房子，二楼一底的房屋倒塌了。

奶奶被压在自家坍塌的房屋下不幸死亡。躲在祖母身下的我，也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右侧上腹部即右乳房下面，受到重伤。

父亲返回来接我和奶奶时，在已倒塌的房里发现了奶奶的遗体以及受到重伤的我。父亲赶紧把气喘吁吁的我抱到医院进行紧急治疗，这样我才得以奇迹般地活过来。

然而，刺进我身体里的弹片非常尖，切断了筋肉，刺得相当深。因此弹片取出后伤口也迟迟不能愈合，还严重化脓。医生多次用棉签一样的东西插进我化脓的伤口处把脓液弄出来，而我忍受不了触碰伤口时的疼痛不断大声痛哭。

还不到3岁的我，在救了我一命的医院里每天尝尽了病痛的折磨，这些折磨正是我对大轰炸的体验，正是我关于重庆大轰炸问题的出发点。

之后，我的伤口渐渐愈合，但伤疤的疼痛持续了很久。73岁的我至今身体上还留有4厘米长的伤痕，在要下雨等天气变化时还感觉疼痛。因此，即使在轰炸已过去70年的现在，我也不得不每天持续着“伤疤疼痛”这个大轰炸所带来的新的体验（关于原告简全碧在1940年8月19日轰炸中受伤的伤痕的照片，参见照片第14页到16页）。

#### 4 和妹妹告别（1940年底）以及母亲的病逝（1944年）

一家人再次无家可归。这次，父亲和小舅邹森云以及其他亲戚在重庆市渝中区道冠井合力搭了个工棚。我们一家四口（父母、2岁的我以及出生不久的妹妹）、小舅一家以及另外一个亲戚的一家共3家人便在此生活下来。

道冠井的工棚非常狭窄、简陋，加上和另外两家人一起住，又很烦杂。并且，日军的轰炸依旧持续着，每次轰炸一来，道冠井的周围就有被投下炸弹的危险。

在这样的环境下，母亲的精神状态越加不稳定，身体也越来越差，明显需要接受治疗。然而，家里除了买食物以外没有多余的钱，无法请医生给母亲看病。

为了安慰卧床不起、精神状态不好的母亲，父亲每天长时间守在母亲身边照顾她。加上父亲年纪也大了，更没有余裕来照顾我和妹妹。

为了改善四面楚歌、深陷困境的家庭状况，父亲跟亲戚商谈、作了很多努力。然而最后，在种种苦恼后，他决定将妹妹简清明送给一家杨姓人收养。

这样，在1940年年底，妹妹被抱去了别人家。万分令人悲伤的是，从那以后，父亲、母亲以及我再也没有跟妹妹见过面。

妹妹被抱走后，父亲、母亲和我还是住在道冠井简陋的工棚里生活。

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仍然持续着，42一年没有进行轰炸，但1943年8月又有了轰炸。

每次一有轰炸空袭警报就会响彻整个重庆市，重庆市民就逃往防空洞里避难。

我每次都和父亲一起跑去防空洞，然而母亲由于长期卧床身体衰弱得越来越厉害，即使在日军空袭来临时也无法去防空洞避难。因此，每次空袭来临时，母亲一人留在道冠井简陋的工棚中，饱受远大于他人的大轰炸的恐惧，这使得母亲的身心更受到折磨。这样，母亲的病情毫无康复的趋势，越发

严重了。

1944 年春，母亲精神上越发消沉，身体衰弱得越来越厉害，在道冠井简陋的工棚里去世了。

然而，即使在母亲病危时，父亲也没有能力把母亲送到医院救治。母亲的去世，是我在战争中最最悲伤的事情。

战争结束后，父亲曾无数次在我面前提起，懊悔当初没能把母亲送到医院治疗。

二姑妈的儿子（陈访桃）出钱为母亲办了简单的葬礼，并把母亲安葬在亲戚所有的土地里。

母亲去世的时候年仅 45 岁。她是我家受轰炸折磨最深的人。日军的轰炸夺取了她生活的希望、碾碎了她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遭遇日军轰炸，母亲绝不可能这么年轻就去世。我一想到持续饱受轰炸的恐怖、最终在万分失意中去世的母亲，即使在今天也忍不住落泪。

母亲去世后，我再次被住在壁山的大舅舅家收养，而父亲则去了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二姑妈家度日。

我去壁山大舅家后，父亲曾来看过我 3、4 次。我仍记得父亲见到我时，泪流满面、慈爱地抱着我的情形。

## 5 战争后痛苦的 10 年生活（1945 年至 1955 年）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我一直生活在壁山大舅邹云臣家。大舅家是农民，靠自己种庄稼过活，几乎没有现金收入。然而家里却有 6 个孩子，因此生活很艰苦，常常吃不饱。

我十分感激我的大舅，正是靠着在大舅家有饭吃，才得以在战争中、战争后继续活下来。不过，对于 6 岁失去母亲、又与父亲分离的我来说，在战后的壁山的日子非常艰辛。

在壁山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是，大表哥的媳妇也就是大表嫂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的欺负。大表嫂大我 10 岁左右，经常欺负我，说我爸爸不要我了、说我是在家吃白饭的人等。

即使在大舅也一起吃饭的时候，大表嫂虽不说出口，却一样用恶狠狠的眼睛瞪着我，一副“你也有资格吃饭”的表情。我十分厌恶她的这个眼神，胜过她开口骂我。

每天我就这样承受着大表嫂的讨厌，本来是小孩子翘首盼望的吃饭时间，却成了我最紧张的时间。每次吃饭我总是两眼无神地把食物往嘴里送，根本不知道食物的味道。由于每天都这样，有时我紧张过度，还出现过吃着吃着饭就晕过去的情况。此外，我因大表嫂欺负我时说的话感到害怕，受不了还离家出走过。

然而，不管大表嫂怎么欺负我，我都没能对任何人说起过。在璧山生活期间，我一直默默忍受着。

2年前，在一个亲戚的生日会上，这个已年过8旬的大表嫂突然间跟我打招呼。我感到很吃惊，因为自从我离开璧山大舅家以后，她从来没跟我打过招呼。大表嫂来到我身边，说想对过去欺负我的事情道歉。整整过去了50多年，才说道歉！

其实，我18岁离开璧山大舅家后，也没有对父亲以及任何人说起过受欺负的事情。比起对别人诉说，我更想全部忘记那些悲伤的记忆。然而，如此倔强地一直努力忘记着那些往事的我，在听到大表嫂亲口承认曾经欺负过我的时候，那一刻，一直深埋在我心里的关于10年苦难的璧山生活的记忆如洪水般全部苏醒，在生日会现场，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大表嫂显出非常尴尬的神情，说了句“以前的事真是对不住”，就很快从我身边离开了。

我觉得，大表嫂是因为害怕有生之年如果她不向我道歉，死后她家会被厄运缠身，才道歉的。

除了受欺负以外，对璧山的生活还有关于学校的回忆。

战争结束那年，二姑妈的孙子特意掏钱援助我上学。父亲的家族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二姑妈也希望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我得以在璧山上私塾旧学。私塾的老师教我们十多个学生朗读三字经、女儿经等。在当时，女孩子

没有必要受教育的观念很强，在私塾里只有我一个女学生。

然而，二姑妈的援助也有限，私塾只上了两年。之后，我就在大舅家帮着做一些农活。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重视对妇女的教育。这个动向也传到壁山，在壁山开设了针对女性的扫盲班。于是，1953 年、1954 年，我也申请上了 2 年扫盲班。

## 6 和父亲一起生活的两年（1956 年、1957 年）、就业（1958 年）以及父亲去世（1959）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在大概两个月后即 11 月底也解放了。然而，二姑妈家被共产党划为地主阶级，没收了财产。父亲一直居住的临江门的二姑妈的房产也没政府征收了。父亲只好借了大姑妈在战争时为躲避日军轰炸而购买的一处房屋，开始了一个人在那里的生活。这个房屋位于重庆市郊外的江北区猫儿石。

而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大舅家生活。1956 年，二姑妈的孙子（陈姓）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年迈的父亲现在独自生活，希望我能回到父亲身边照顾他。

这样，1956 年，18 岁的我离开了壁山大舅家，回到住在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的父亲身边。此时，父亲已经 72 岁，没有任何收入，靠二姑妈的二儿子的资助生活，另外当地村委会也给一点救济。

由于没有工作的我的到来，父亲家的生活更加艰辛了。不过，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我因为能与父亲团聚、一起生活而感到很幸福。

1956 年、1957 年，在二姑妈的孙子的支助下，我得以在江北区猫儿石民办中学念了初一初二两年学。

1958 年，我迎来了巨大的转机。这一年，中国政府打出了“大跃进”政策，我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在上初中 2 年级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浪潮，我得以在位于江北区猫儿石的



重庆通用机械厂就职。

工作后，我与父亲分别，搬进了厂里的职工宿舍居住。对我来说，唯一惦念的是父亲的健康。然而不幸不久就降临了。我工作后不久，在 1959 年元月，父亲突然去世。要是平日里能够摄取更多更充分的营养，也许父亲就不会去世了。为此我也懊悔万分。

对于去世的父亲的心情，我想也只有“悔恨”二字了。父亲在日军的轰炸中被夺去了一切财产和工作的机会，年轻的妻子在自己面前死去，两个孩子——二女儿抱送他人不能见面，大女儿也只能拜托亲戚代为养育。父亲万分悔恨的心情可想而知。父亲，请在天堂与母亲见面！

## 7 从结婚（1966 年）到生产（1970 年、1972 年）到退休（1989 年）的生活

能找到工作我非常高兴，每天都在工作上投入了万分热情。然而 1960 年，政府以大跃进用人过多为由，开始相继裁员。我因户口远在跟父亲一同居住过的农村而也被解雇了。我一面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一面找劳动部门的领导反映情况。最后，我作为没有家没有依靠的“孤儿”受到特殊照顾，得以在原厂复原工作。

然而，通过这个复原的经历，我再也无法回避自己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孤儿”的事实。回忆起母亲、妹妹以及父亲的悲剧，我独自流泪不止。

1963 年，我与来工厂工作的大专生吴启琨相识，确立了恋爱关系。此时已 25 岁的我也考虑过结婚，但由于很在意自己在轰炸中身体上受过伤，迟迟下不了结婚的决心。这是因为，轰炸中所受的伤并没有痊愈，我对自己的体力毫无信心。即使在车床旁车零件的工作时间，我的右侧上腹部即右乳房下的伤疤也常常作痛，每次我都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稍作休息，忍耐疼痛。

此外，还让我苦恼的是，由于轰炸受伤，我右乳房不能正常发育，左右乳房大小不一。这个差异在夏天穿着单薄时能被明显看出来，这使我感到自卑。

这样，我对自己身体的自卑感一直无法消失，怎么也拿不出决心结婚的自信。

然而吴启琨是一个非常怜悯我的人。他同意不逼我而慢慢交往。这样我的心结一点点解开，终于能够下了结婚的决心。1966 年，我和吴启琨结婚了。

婚后，我终于觉得有一个自己的家了，第一次把自己多年来的艰辛告诉丈夫。丈夫总是温和地安慰我，我也从心底信任丈夫，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幸福。

然而，婚后的生活也波折不断。在我结婚那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受此影响，婚后一年多的 1967 年，丈夫被调职。这样，丈夫离开重庆前往自贡红旗运输机械厂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 1977 年的十年间，我几乎都跟丈夫相分离而独自生活，被迫过着偶尔才能相见的不正常的生活。

不过在此期间，我得以怀孕，于 1970 年生下长子吴曲，1972 年生下长女吴竹。1977 年，丈夫调回重庆，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

之后，我一直在重庆通用机械厂工作，1989 年退休。然而，万分不幸，在我退休仅仅两年后的 1991 年，丈夫因肺癌去世。

现在，我靠着退休金一个人生活。然而，我的生活依然不平静。2004 年，我的儿子被检查出尿毒症。他现在只有 40 岁，因为得知自己患了尿毒症而决定跟妻子离了婚。儿子没有工作，没有人帮助他，也只有我用我的退休金给他一些帮助。原本就不富裕的我，到了这个年龄生活更加拮据。

## **8 要求日本政府理解受害者心情、尽快谢罪、赔偿！**

2004 年，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为了以日本国为被告提出诉讼，而成立了原告团。我也在此时加入了原告团。

我参加原告团的理由，是强烈地希望更多人能理解在日军轰炸中受害的重庆市民的苦难。

由于日军军机从空中投下无数炸弹和燃烧弹，在地上生活的无名的重庆市民们，他们正在展开的人生因此彻底被改变。我家庭 4 人，我的父亲、母亲、妹妹以及我自己的人生，也因为日军的大轰炸而被搅得乱七八糟。这个事实怎么也得让日本政府的责任人知道。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参加了原告团。

73 岁的我至今仍然经常梦到大轰炸。梦到最多的情景是在防空洞中被大人们骂的画面。在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防空洞中，我时常哭泣、呼喊母亲的名字。而周围的大人们不久就愤怒地骂我说，“再闹把你扔出洞去”。在梦中，是一个被骂而低头不语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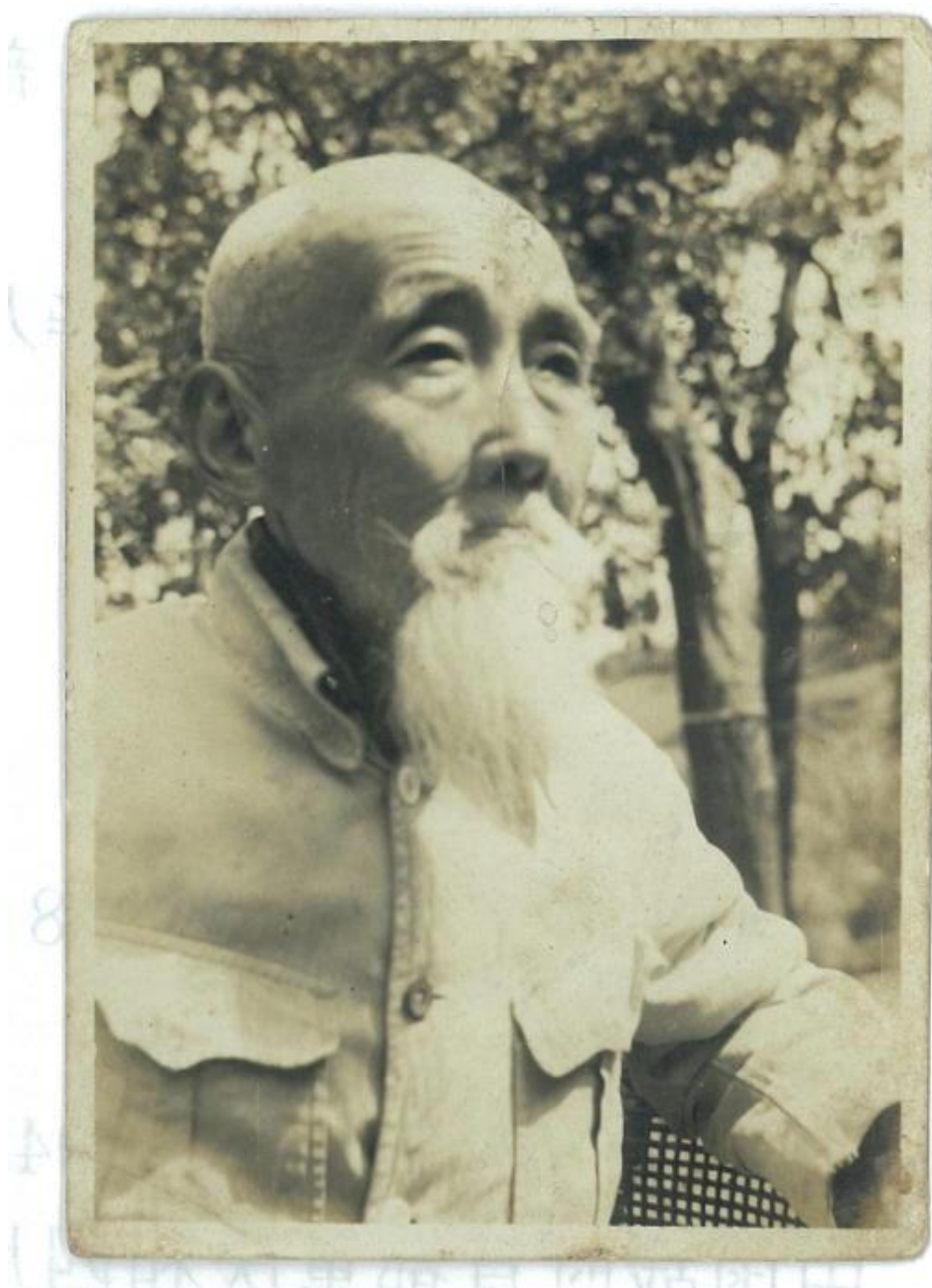
还有就是梦到预报空袭的灯笼的画面。接着又梦到我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画面，那个苦痛在梦中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大叫着从梦中醒来。

日本各位法官，请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即使已经过去 70 年还做着大轰炸恐怖的梦的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

对于无差别重庆大轰炸而带来的苦痛和恐怖，至今仍没有消失！我们是为了寻回人间的尊严而提起诉讼的！

强烈要求法官能理解以上所述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心情，刻不容缓对原告受害者做出谢罪和赔偿！

完



父亲简少堂（1955 年，71 岁）。当时父亲住在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这张照片是父亲坐在自家庭院里的果树旁的椅子上照的。摄影人是站在房子所在的位置照的。



大姑妈



大姑妈（左）和二姑妈





这是 1940 年 8 月 19 日日军轰炸之际，怀抱着原告简全碧准备去防空洞避难、却被压在因轰炸而倒塌的自家房子下死亡的祖母的照片。此照片摄影于重庆杂粮市“晴霞”照相馆（电话 117）。



展示因轰炸而受伤的伤疤很深。  
摄于自己的家里（2008 年）





展示因轰炸而受伤的伤疤很深。  
摄于原告团弁公室（2009 年）





展示因轰炸而受伤的伤疤很深。  
摄于原告团弁公室（2009 年）







